

“不拿武器”的侵略： 日本对华“宣抚工作”与“宣抚文学”研究刍议

黄彩霞 王升远

(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复旦大学 外文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 1930年代日军故意借唐代“宣抚”一词创建“宣抚班”对华实施“宣抚工作”,并在对外侵略战争的时代语境下炮制出大量的“宣抚文学”。所谓“宣抚工作”其实是越界、变质了的“宣抚”,表明了日本帝国主义欲置沦陷区于其统治之下的侵略野心。“宣抚工作”是一项组织化、体系化、专门化了的系统工作,是与军事行为相配合的文化战、思想战。“宣抚文学”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宣抚工作”的实际样态,是日本战争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承载历史记忆的“宣抚文学”文本挖掘出来进行研究,不仅对战时及战后日本文学史及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进一步梳理日本侵华史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 宣抚; 宣抚班; 宣抚工作; 宣抚文学; 日本侵华史

[中图分类号] I10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 [2018]06-0084-07

DOI:10.14112/j.cnki.37-1053/c.2018.06.011

20世纪30年代,日军为保障对华侵略的顺利推进,巩固在中国沦陷区的统治,故意借鉴唐代“宣抚”一词及其组织形式创建“宣抚班”,对华实施“宣抚工作”,并在侵略战争的时代语境下炮制出大量的“宣抚文学”。日军对华“宣抚工作”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侵华战争中消磨沦陷区中国国民的抵抗意志,减小侵华阻力,为日本侵华起到了“润滑油”的重要作用。以“宣抚工作”为题材的“宣抚文学”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宣抚工作”的实际样态,既是日本战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昭和前期日本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本应成为日本侵华史、思想史和侵华文学研究领域重要内容之一的“宣抚工作”与“宣抚文学”却长期受到学界的“冷遇”,尤其是“宣抚文学”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中日文学文化关系史中一直处于被遮蔽状态,鲜见关注者。管见所及,中国学界不仅对“宣抚工作”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对“宣抚文学”的研究状况也甚为惨淡。战后70年已逝,但东亚地区并未摆脱近代以降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历史重压,围绕战争责任、历史认识,中日、韩日纷争不断。本文试图以“宣抚工作”和“宣抚文学”为切入点,揭示日军“宣抚工作”和“宣抚文学”配合军事征伐“一文一武”地对中国实施侵略与加害的缘起、组织形式、工作实绩及其影响。

一、日语辞典中的“宣抚”释义及其问题

“宣抚”一词起源于唐代。唐代宣抚使最初作为唐朝廷临时派遣的赈灾特使,赴受灾地区代表皇帝视察灾情、抚慰灾民、主持赈灾事宜,至唐后期宣抚使的赈灾职能逐渐减弱,多数宣抚使出使大都与安抚平定藩镇、调节诸道纷争、协调地方关系有关,所谓“宣慰者,宣上命以慰安反侧也”^①。将“宣抚”二字拆开来看,“宣”即宣传、宣扬皇帝政令,“抚”即安抚、抚慰因灾害或战争而不满、焦虑的军民。也就是说,唐代的宣抚是

收稿日期:2017-10-12

作者简介:黄彩霞(1978—),女,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东方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中日文学关系。

王升远(1982—),男,文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中日文学关系。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方学’体系建构与中国的‘东方学’研究”(项目编号:14ZDB083)之子课题“中国‘东方学’中的日本及东亚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①参见毛阳光《遣使与唐代地方救灾》,《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为维护地方安定,由中央对地方、由上而下实施的宣抚,宣抚者与宣抚对象之间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垂直关系。换言之,“中央对地方”“统治对被统治”是唐代宣抚的逻辑前提。

在汉语“宣抚”一词早已成为死词的1930年代,日语“宣撫(せんぷ)”一词却在日本被重新激活,成为在帝国军政领域出现频率极高的“新词”,一直“流行”至日本战败前。正如竹内实曾指出的那样“‘宣抚’或‘宣抚班’一词,虽然在今天的日语中已是死词,但从‘卢沟桥事变’以后,在整个日中战争期间,这却是一个带有某种浪漫主义色彩的、时髦的、思想性、政治性用语。不可否认,它像咒语一样试图使人忘却日本在中国军事行动的可耻性(多少或无意识地意识到的)。”^①为梳理“宣抚”一词在日语中的流变,笔者在日人编纂的日语辞典中对“宣抚”及其相关词汇进行了调查,发现日人编纂的日语辞典中对“宣抚”的释义大致有三:一是指中国唐代官名,即宣抚使;二是指由明治政府为镇抚明治初年骚乱而在日本国内临时设置的宣抚使所实施的宣抚;三是指向日军占领区人民宣传日本的占领方针、政策等来安抚民心。日语辞典中对“宣抚”的释义向我们呈现了“宣抚”一词在日语中语义流变的轨迹,即宣抚使制度传至日本后,除1870年(明治3年)明治政府为镇抚长门国山口藩(今山口县萩市)之乱而照搬唐制临时设置宣抚使之外,“宣抚”一词基本作为一个无“生命”的外来词而存在,直至因侵华需要而实施“宣抚工作”,“宣抚”一词才应运而“再生”,在日语中被赋予了具有强烈时局性的现实意义。

管见所及,“宣抚班”一词最初被收入日人编纂的辞典至少可推至1939年2月出版发行的汉和词典《新字鑑》^②(盐谷温编,新字鑑刊行会出版)。其中对“宣抚班”的释义为:担任对占领区人民进行安抚、引导的工作。何谓“占领”?查《大言海》可知,“占领”就是“战争中一方交战国的军队在另一方交战国的一个地方建立事实上的权力”^③。1944年版《新字鑑》也解释为“通过交战夺取敌人的土地、阵营、物品等。”^④显然,对于一个在别国的土地上发起战争的国家来说,“占领”即意味着“侵占”“侵略”,那么“占领区”即意味着通过“侵占”“侵略”别国而得来的土地。因此,《新字鑑》对“宣抚班”的释义无疑透射着日本对华战争的殖民侵略属性及“宣抚班”在此侵略战争中所“扮演”的战争参与者或“协力”者的角色。

在日本侵华的历史语境下,日本对华“宣抚工作”之目的在于在日军占领区安定人心,为实现日军侵略中国的野心而尽可能减少来自中国民间的抵抗,并使其向“亲日”“协力”侵华方向发展。日军“宣抚班”与唐代宣抚使制度的宣抚对象的不同决定了二者本质上的区别,前者将宣抚之“手”伸向了别国,违背了宣抚和宣抚使制度存在的逻辑前提(即在一个国家内部,自上而下地由中央对地方、统治对被统治),是越界、变质了的“宣抚”。但此种越界并非源自日本对唐代宣抚概念的误解,而是日军有意为之,表明了日本帝国主义欲置中国于其统治之下的侵略野心。

在宣抚使制度早已消亡的1930年代,日军故意借唐代“宣抚”一词并赋予其新意,设置“宣抚班”,对华实施“宣抚工作”,虽然披着“宣抚”的外衣,却掩盖不了日军欲将中国置于“被统治者”与“被征服者”地位的侵略野心与侵略性质。正如王向远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意味着日本把中国的沦陷区作为日本的‘地方’,并加以巩固和安定,具有赤裸裸的殖民主义侵略的含义”,日军对中国沦陷区民众进行的“宣抚工作”,“是日本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的所谓‘思想宣传战’的主要形式和途径,在日军‘思想宣传战’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日军“对付中国人民的软刀子”。^⑤

二、“宣抚班”与“宣抚工作”

“七七事变”后,为保障对华侵略的顺利推进并巩固在中国沦陷区的统治,日军在中国大规模地创建“宣抚班”,对华实施“宣抚工作”。“宣抚班”,简单说就是日军设立的专门实施“宣抚工作”的组织机构。“宣抚班员”一般由“日、满、支”人组成,其中,日本人“宣抚班员”在当时被日本人尊称为“宣抚官”,属“军属”(军

①[日]竹内实「大東亜共栄圏・宣撫の思想(上)」,『新日本文学』(27卷10号)1972年,第42-56頁。除特殊注释外,本文所引日文献均为笔者自译,以下不另注。

②《新字鑑》出版之际,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亲自为其题字“温故知新”,并赫然印在该词典的扉页,伪满皇帝的弟弟溥杰出席该词典出版纪念大会并在会上致祝辞。其“国策词典”的身份也为著者带来了切实的利益,一出版便频繁再版,至1944年2月已增补167版,发行量达5万册,堪称创造了日本词典出版界的神话。

③[日]大槻文彦、大槻茂雄『大言海』(第3卷),富山房1934年版,第98頁。

④[日]塩谷温『新字鑑』(增補167),弘道館1944年版,第323頁。

⑤王向远《“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頁。

队文官——笔者注。“宣抚工作”即“宣抚班”为配合侵略战争而实施的各种“宣抚”活动的统称。下文将对“宣抚班”的创建与发展以及“宣抚工作”的目标、任务、实施等情况作以简述。

(一) “不拿武器的战士”——“宣抚班”的创建与发展

关于日军“宣抚班”创建的源头,大致可追溯至伪满洲国时期。据说“宣抚工作”最初是由时任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根据其在中国的工作经验所倡导的。^①关东军为讨伐东北抗日义勇军,初期阶段委托协和会等民间组织派遣人员跟随作战部队赴各讨伐地区开展“宣抚工作”,进行建国精神的宣传以及与当地民众的沟通等。1932年下半年关东军司令部组建“宣传队”,开始直辖“宣抚工作”。“宣传队”下设宣传班,班长由军人担任,班员由满铁社员、协和会人员、伪满洲国政府派遣人员等构成。据《关东军宣传队》记载,八木沼丈夫(1895.11—1944.12)曾作为“关东军宣传队”“第四宣传班”班员到战争前线进行“从军宣抚”。^②这一点在“八木沼丈夫年谱”中也有记述:1932年11月“作为关东军宣抚官赴海龙(奉天省海龙县,现吉林省梅河口市——引者注)、西丰(奉天省西丰县,现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引者注)方面从军”,同年12月“随天野部队及独立守备队赴三角地带从军宣抚……宣抚工作持续至次年一月末”。^③“由于他们从军宣抚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被关东军另行组编,归其指挥。”^④此处“被关东军另行组编”应指关东军组建“宣抚班”一事。1933年2月27日,“关东军宣抚班”在“奉天”正式成立,八木沼丈夫任第八师团军“宣抚班”班长。“关东军宣抚班”的“宣抚”效果及其“宣抚工作”的经验,作为先例为“七七事变”后日军在中国大规模组建“宣抚班”、全面开展“宣抚工作”奠定了实践基础。

八木沼丈夫是日军对华“宣抚工作”史上里程碑式的“灵魂人物”,据说“宣抚官”之名就是八木沼丈夫故意借唐代宣抚使制度的宣抚之意而命名的。^⑤“七七事变”后日军司令部授命八木沼丈夫组建“宣抚班”,这意味着八木沼关于“宣抚工作”的思路与日军侵华的现实需求在方向上是一致的。据《宣抚班小史》记载:1937年7月21日,八木沼丈夫受日军天津司令部命令急赴天津开始着手制定组建“宣抚班”的全盘计划,这一天被视为“北支宣抚班”的发端;8月9日53名“满铁派遣社员”到达天津,当天编成7个班,被分配到“北宁线”铁路沿线一带从事“宣抚工作”;8月29日“宣抚班本部”成立,1938年1月18日“宣抚班本部”随军司令部由天津迁至北京;随着日军战线的不断延伸,“宣抚班”的规模迅速膨胀,至1937年末“宣抚班”已发展为80个班829人,至1938年末更是高达128个班1556人。^⑥

华北地区“宣抚班”在发展过程中历经两次转属:1938年1月1日,“宣抚班”由日军“宣传部”转属“特务部”,“宣抚班本部”改称“特务部宣抚班本部”,八木沼丈夫任“特务部宣抚班总班长”。“特务部宣抚班本部”为中央领导机构,各军、各兵团配设“宣抚指挥班”,一线部队设“宣抚班”。1938年12月末“宣抚班”再次转属,由“特务部”直接转属为“北支那方面军”,一跃成为“方面军”直属机构。“宣抚班”的这两次转属清晰地描绘出在日本侵略军内部“宣抚班”因其工作的有效性而由边缘地位渐趋中心化的游移轨迹。1940年2月下旬“宣抚班”解散,3月1日正式并入新民会。^⑦但是“北支那方面军”的对华“宣抚工作”并未随着“宣抚班”的解散而终结,“宣抚班”并入新民会后,后者继承了“宣抚班”的“遗志”,继续实施“宣抚工作”,同时因合并而产生的“过剩宣抚官”也大部分被编入各军、各兵团的“宣传班”继续在中国进行“宣抚”活动。

虽然“北支宣抚班”仅在中国存在了不足3年的时间,但其开展的“宣抚工作”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却使日军受益颇深,并使“宣抚”的思想深深扎根于整个日本侵略战争中。上海沦陷后,“中支那方面军”也于1937年11月27日正式设立华中地区“特务部总务班宣抚班”,至1938年3月发展为37个班分布于华中各地。^⑧华南地区的“南支方面军”自然也不例外,也设“宣抚班”对民众实施“宣抚工作”。可以说,几乎侵华日军所到之处皆有“宣抚工作”配合其军事侵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又将“宣抚班”这一发源

①[日]清水亮太郎「満洲国統治機構における宣伝・宣撫工作」,『戦史研究年報』17号,2014年,第49-75頁。

②[日]關東軍參謀本部編、防衛研究所戦史研究センター所蔵『關東軍宣撫隊』,1932年,第3頁。

③[日]八木沼春枝編『遺稿 八木沼丈夫歌集』“年譜”,新星書房1969年版,第280頁。

④[日]青江舜二郎『大日本軍宣撫官—ある青春の記録』芙蓉書房1970年版,第78頁。

⑤[日]青江舜二郎『大日本軍宣撫官—ある青春の記録』芙蓉書房1970年版,第78頁。

⑥[日]北支方面軍總務係文書、防衛研修所戦史部所蔵『宣撫班小史』,1939年,第3-16頁。《宣撫班小史》是日军为新招收的日本人宣抚班员进行培训的讲义,记录了“北支宣抚班”自创建以来至1939年“宣抚工作”开展的大致经过。

⑦[日]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北支の治安戦』(1)朝雲新聞社1968年版,第295頁。

⑧[日]井上久士『十五年戦争極秘資料集⑬ 華中宣撫工作資料』(解説)不二出版1989年版,第7頁。

于侵华战争的组织形式引入东南亚各国,在那里继续发挥其“宣抚工作”的“润滑油”作用。

(二) “战场之母”——“宣抚工作”的目标与实质

1938年9月寺内(寺内寿一,第一任“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笔者注)部队“宣抚班本部”制定的“宣抚工作指针”中规定“宣抚工作”的实施要点包括:安定镇抚民心、维持治安、协助部队、爱护铁道、复兴经济产业、促进教育文化等,并明确了“宣抚工作”的目标:

确保皇军出动地域内交通、通讯线路安全,以期保障用兵作战之完善;安抚民心,培养复兴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尤其在作战区内,要阐明中国军队败退的真相,同时使民众了解皇军出动的本意及其威力,引导他们由畏惧到亲善、由亲善到合作,以实现军民协力、灭党反共的目的。^①

可见,“宣抚工作”的目标实际是为了尽可能减少来自中国民众方面的阻力,促使沦陷区民众“协力”,以实现日军侵略中国的野心。尤其在作战区内,为使中国民众由畏惧而生“亲善”则更加注重日军“威力”的宣传,故作战区的“宣抚”毋宁说是一种威逼利诱下的胁迫。

作为日军“宣抚班”最高指挥者和“宣抚”思想总灌输者的八木沼丈夫,却将“宣抚班”的这种直接参与或“协力”侵略战争的行为视为对中国民众的“拯救”行为。《大日本军宣抚官》封底处登载了一首由八木沼丈夫作词的歌颂和激励“宣抚官”的歌词——“不拿武器的战士(宣抚官)之歌”^②,歌中赞美“宣抚官”是“战场之母”,激励他们要“涌兴亚之泉”。“母”代表慈爱,“战场”则意味着暴力与血腥。八木沼丈夫之“战场之母”的比喻意在突出赞扬“宣抚官”们为“拯救”中国民众而来到血腥战场的“慈爱”与“伟大”,以此为“宣抚官”及其“宣抚工作”蒙上了一层犹如“天使”般“高尚”的面纱,但他却故意忽略了自己(日本)本身就是这场“暴力血腥”制造者的事实。八木沼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使“宣抚官”们忘却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掩盖“宣抚工作”本质上“协力”侵略战争之属性,并激励他们为“涌兴亚之泉”而努力。八木沼丈夫还告诫“宣抚官”们:

你们是不拿武器的战士(中略)你们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你们的真心,你们要用它去打败无知的或有着错误思想的中国百姓的迷惘。(中略)进入现地后首先必须要对日本人进行宣抚,不论是军人、官员、还是商人,多数人都会由于错误的优越感而如奴隶般地对待中国人,孰不知这会给完成圣业造成多大的障碍。^③

虽然八木沼丈夫为掩饰“宣抚工作”的侵略性,故意夸张地为“宣抚官”唱赞歌,赞美他们是“拯救”中国民众于战祸的“伟大”的“战场之母”,但他无论如何都掩盖不住“薄纱”之下“宣抚工作”的“底色”,其言行中无不透射着“宣抚工作”本来的狰狞面目,即不管对中国百姓实施何种程度的怀柔策略,其实质始终是为协助日军完成所谓的“圣业”而采取的途径与手段。

(三) 组织化、体系化、专门化——“宣抚工作”的任务与实施

如前所述,铁道爱护工作作为“宣抚工作”的实施要点之一,是“宣抚班”的一项重要任务。1938年6月23日“北支方面军”下发了《关于北支铁道爱护工作的通牒》,《北支的治安战(1)》根据此通牒整理出了“铁道爱护工作”的方针:

铁道爱护村是指铁道沿线两侧约5公里地域内的村庄,原则上与普通行政区一致;行政村长为爱护村村长,全体村民都是爱护村村民;铁道爱护村就是以村为基础,省、县、区负责监督指导,军、官、铁、民团结一致的融合组织;爱护村村民受命于爱护村村长,全员都有义务爱护指定的铁道、公路及通讯线路,同时接受各种恩惠。^④

不难看出,日军俨然将自己置于“统治者”的地位,强迫中国沦陷区民众承担“铁道爱护工作”的“义务”,让百姓维护道路安全与通讯畅通,为日军进一步侵略中国做好“后勤保障”。而“铁道爱护村”的组织、情报联络网的设定、区域线路巡察的实施、铁道沿线高杆植物的收割与禁植、爱护思想的普及贯彻等工作均由“宣抚班”负责组织实施。“宣抚工作”分为跟随日军作战部队在作战区开展的动态的“从军宣抚”和在日军占领区进行的相对静态的“固定宣抚”,“铁道爱护工作”就是“固定宣抚”的重要任务之一。

①[日]寺内部队宣抚班本部编、防衛厅防衛研修所战史室所藏『宣撫工作指針』,1938年,第2頁。

②[日]青江舜二郎『大日本軍宣撫官—ある青春の記録』芙蓉書房1970年版,第372頁。

③[日]青江舜二郎『大日本軍宣撫官—ある青春の記録』芙蓉書房1970年版,第110頁。

④[日]防衛厅防衛研修所战史室編『北支の治安戦』(1)朝雲新聞社1968年版,第78頁。

根据《北支的治安战》中“宣抚工作实施要目一览表”^①可知“从军宣抚”和“固定宣抚”的主要任务。前者主要任务有：劝说离散民众归乡、组织、指导治安维持会、收集情报、对敌宣传、人力、马车、物资的调配与宿舍的安排、收集兵器、弹药、弹壳、清扫战场、清除抗日物品、展示亲日物品、协助日军消灭国共两党组织、保护兵站线等。后者主要任务包括：第一，劝说离散民众归乡，主要通过张贴布告、慰抚等形式对离散民众进行宣传；第二，镇抚工作，通过“纠正”民众对战争的“错误”认识，保护良民的生命财产，救济难民，施疗、施药，开设民众问事处，张贴布告、海报、传单，举办演出等各种活动来安定民心；第三，实施所谓的“建设”工作，包括政治工作、治安维持工作、铁道爱护工作、经济产业复兴工作、教育文化促进工作等。

由此可见，日军“宣抚班”的“宣抚工作”绝不是无组织、无计划的散兵游勇，而是一项极为组织化、体系化、专门化了的系统工作，是与军事行为相配合的文化战、思想战。不论是作战区的“从军宣抚”还是日军占领区的“固定宣抚”，其任务不仅包括对中国民众实施“宣抚”活动，为日军作战部队提供战争支持与保障也是二者重要的工作内容，这也暴露出“宣抚官”并非如八木沼丈夫所宣扬的“拯救”民众于战祸的“战场之母”，而是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协力”者及参与者的本来面目。

三、“宣抚文学”的范畴再思

日本文学史中鲜有提及的“宣抚文学”这一概念是由王向远先生开创性地提出的，开启了日本侵华史和日本侵华文学研究的新视角。何谓“宣抚文学”？王向远先生在其著作《“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中指出：“以日军的‘宣抚’活动为题材的侵华文学，我们可以称为‘宣抚文学’。”^②那么，反之是否亦成立？大概受到史的著述体例的限制，先生未对“宣抚文学”的概念及其研究状况展开详细的论述，这也为日本学研究者们的“接着说”留下了空间。笔者在上述“宣抚文学”概念的基础上，多方查阅资料，对“宣抚文学”有了以下几点新的认识。

“宣抚文学”是广义的文学范畴，内容上以日军的“宣抚”活动为题材。从作为“宣抚文学”题材的“宣抚”活动所涉及的空间范围来看，“宣抚工作”发源于侵华战争，但不仅限于侵华战争，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逐渐辐射至东南亚各国，直至日本战败。那么，诸如《与火线共存亡：缅甸作战宣抚手记》（能势正信，东洋堂，1943）等以日军对东南亚各国“宣抚工作”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自然也应属于“宣抚文学”的范畴。因此，“宣抚文学”的指涉范围可扩大至以日军的“宣抚”活动为题材的战争文学。其中，以日本对华“宣抚工作”为题材的“宣抚文学”既是日本侵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日本侵华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视角。

“宣抚文学”的创作者多为非职业作家的日军“宣抚官”。日军为提高“宣抚官”的“教养”，在日本本土招聘“宣抚官”时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选拔，报名资格须为大学或高专毕业，选拔时需经笔试与面试两轮考核。^③较高的文化层次使“宣抚官”们具备了创作“宣抚文学”的条件与可能，战时许多“宣抚官”都基于自身的“宣抚工作”经历写出了反映“宣抚”活动的“宣抚文学”作品。此外，“宣抚文学”的创作者还包括部分从军作家（如上田广等）、由报社或杂志社派遣的部分新闻工作者或作家（如岸田国土等），以及“皇军慰问团”的部分“转向者”（如本田弥太郎等）。

笔者管见范围内，仅“宣抚文学”的单行本数量就很可观。如《北支宣抚行》（小池秋羊^④，都新闻，1939）、《地貌：宣抚官诗集》（岛崎曙海，二〇三高地诗社，1939）、《医疗宣抚行》（新垣恒政，东亚公论社，1940）、《宣抚班》（岛崎曙海，今日问题社，1940）、《宣抚行》（川夜濂不逢，作家社，1940）、《爱的宣抚行》（山本英一，教文馆，1942）、《宣抚官》（小島利八郎，锦城出版社，1942）、《青春的戎衣》（松永健哉，帝教书房，1942）、《陆战队宣抚记》（木场敬天，清水书房，1942）、《支那乡镇杂话 长江宣抚记录》（熊谷康，大连日日新闻社，1943）、《大陆的土与人》（田代弘，秀文阁书房，1944）等。此外，还有散见于部分作品集或某部作品的部分章节之中的“宣抚文学”文本，如岸田国土著《北支物情》（白水社，1938）中描写“宣抚班”的内容部分、战后整理出版的《遗稿 八木沼丈夫歌集》（八木沼春枝编，新星书房，1969）中关于描写“宣抚”活动的诗歌等，也都属于“宣抚文学”作品。

①[日]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北支の治安戦』(1) 朝雲新聞社 1968年版,第79頁。

②王向远《“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

③[日]青江舜二郎『大日本軍宣撫官—ある青春の記録』芙蓉書房 1970年版,第118頁。

④据《北支宣抚行》序言所记，该作品实际为“宣抚官”大河原秀雄所写，小池秋羊当时作为“都新闻”（“东京新闻”的前身）社社会部主任考虑到“检阅”问题，对原作进行了适当删改。

战争虽早已结束,但关于战争的文学记述却仍在继续,同样地,“宣抚文学”的创作与出版也并未随着二战的结束而终止。战后,部分“宣抚工作”亲历者以“宣抚工作”回忆录、战时手记等形式公开出版相关作品,如《不拿武器的战士:一个宣抚班员的手记》^①、《黄土的残照:一个宣抚官的记录》^②,等等。因此,“宣抚文学”不仅包括战时出版的“战时宣抚文学”作品,还应包括战后出版的“战后宣抚文学”作品。虽同为“宣抚文学”,但其创作并公开出版的目的及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的不同应是二者最大的区别。战时体制下出版的“宣抚文学”作为日本国策文学的一部分,其目的自然是为了宣传和鼓吹战争,而战后出版的关于“宣抚工作”的回忆录、手记等作品,其目的多数是为了记录并使读者了解作者作为“宣抚工作”亲历者曾经历的那段引以为豪的、燃烧了青春与激情的历史(如《不拿武器的战士:一个宣抚班员的手记》),或者作为历史的“实证”使读者了解那段正在或已经被遗忘的“宣抚官”们所战斗与生活过的历史(如《黄土的残照:一个宣抚官的记录》)。当然,这些作品究竟能给没有战争记忆的日本年轻一代传递怎样的“宣抚工作”史观和战争史观,正是需要今人去研究的问题,这也是“战后宣抚文学”的重要研究价值之一。

总之,作为日本战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宣抚文学”似应在日本文学史、思想史叙述中占有一席之地。一方面,“宣抚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宣抚工作”的实态,可以成为历史研究者研究日军“宣抚”史的重要窗口;而另一方面,在文学被要求“协力”战争、舆论被严厉管制的战时体制下,“宣抚文学”的创作者们并不敢、亦不能如实描写“宣抚工作”的真实历史,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宣抚文学”中的“宣抚工作”往往是被美化或被修饰了的。因此,面对“宣抚文学”的虚虚实实,今人需要对其进行冷静辨析才有可能逼近历史真实。

四、拒绝遗忘——“宣抚工作”与“宣抚文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如前所述,日军对华“宣抚工作”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此炮制的“宣抚文学”在日本侵华文学、战争文学中占有特殊地位,为日本侵华史研究、战时及战后日本文学史与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可能与空间。

关于“宣抚工作”,近年中国学者对其关注逐渐增多。曹大臣的《日本占领华中初期的基层控制模式——以太仓县为中心(1937—1940)》^③一文对宣抚班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④,王萌的《日本对沦陷后南京的“宣抚”工作》^⑤针对战时南京的“宣抚工作”进行了详细考察,《日军宣抚班档案史料》^⑥等历史档案的整理与出版也为国内学者研究“宣抚工作”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但目前国内学者尚缺乏从日本侵华史角度对“宣抚工作”进行的系统性梳理以及共时意义上各沦陷区“宣抚工作”的差异性研究。日本学界关于对华“宣抚工作”的研究较国内丰富,大致可分为作为“宣抚工作”内容之一的日语教育研究、作为“宣抚工作”手段之一的“连环画剧”研究、宗教与“宣抚工作”的关系研究、军事史角度的“宣抚工作”研究等几个方面。其中,军事史角度的“宣抚工作”研究大多集中于华北地区和伪满洲国的“宣抚工作”,而关于华中、华南地区“宣抚工作”的研究则较为少见。竹内实根据“宣抚文学”作品中有关“宣抚工作”的描述对“宣抚的思想”进行了研究,并于1972年发表了《大東亜共栄圏・宣撫の思想》(上、下)两篇文章,但其文的发表并未在日本学界引起较大的反响进而引领“宣抚文学”研究的潮流。时至今日,日本学者关于“宣抚文学”的研究仍屈指可数,主要代表性成果有:五岛庆一从“作为过程的宣抚”的角度对赤川武助《我的战场日记》的研究^⑦、原刚和野村乙二郎关于“宣抚官”渊上辰雄的《派遣日记》的系列研究^⑧、工藤信弥对“宣抚工作”与作为获取民心有效手段之一的电影的研究^⑨、丰川慎基于菲律宾宗教“宣抚班员”与一位基督教徒战犯的手记对宗教

①[日]岡本勇平『武器なき戦士 ある宣撫班員の手記』北国出版社1982年版。

②[日]村上政則『黄土の残照 ある宣撫官の記録』文芸社2004年版。

③曹大臣《日本占领华中初期的基层控制模式——以太仓县为中心(1937—1940)》,《民国档案》2004年第1期。

④张泰山《论抗战时期日伪在湖北沦陷区的文化控制模式》,《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⑤王萌《日本对沦陷后南京的“宣抚”工作》,《日本侵华史研究》2017年第2期。

⑥赵焕林主编《日军宣抚班档案史料》线装书局2015年版。

⑦[日]五島慶一「赤川武助『僕の戦場日記』論—手続きとしての宣撫」,『三田國文』(43号)2006年第1—14頁。

⑧[日]原剛、野村乙二郎「淵上辰雄の宣撫班『派遣日記』」(第1—12回),『政治経済史学』第556—567号,2013年4月—2014年3月,连续发表12篇。[日]野村乙二郎「淵上辰雄宣撫官『派遣日記』の思想的特異性」,『政治経済史学』(568号)2014年4月,第27—38頁。[日]原剛「淵上辰雄の宣撫班『派遣日記』:宣撫班と宣撫工作」,『政治経済史学』(571号)2014年7月,第39—45頁。

⑨[日]工藤信弥「日中戦争期日本陸軍における宣撫工作与映画交流:民心獲得のための活動として」,『軍事史学』(第52卷2号)2016年9月,第68—86頁。

的战争责任展开的研究^①等。目前已被发掘和研究的“宣抚文学”作品仅为冰山一角,大量的“宣抚文学”文本有待进一步挖掘和研究。管见所及,在王向远先生之外中国学界对“宣抚文学”的研究更是殆近于无。

目前中日两国学界,尤其中国学界对日军“宣抚工作”与“宣抚文学”的关注不够确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与我国的日本学研究者长期以来坚持“超越历史”的日本论不无关系。王升远曾指出中国学者一定要有“中国芯”的问题“近年来,中国人面对日本的‘问题意识’与研究立场同日本学者逐渐趋同的倾向值得警惕”,“中国学者应有不同于日本学者的‘本土意识’与‘问题意识’。日本侵华时期,不少‘日本通’最终沦为‘通日本’的惨痛教训,究其原因恐怕便在于‘中国芯’的丧失。一般日本论、日本人论如是,落实到涉日学术研究更是如此”。^②另一方面,与长期以来“宣抚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中一直处于被遮蔽状态亦不无关联。“宣抚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中“不受待见”的原因可能在于以下几点:第一,与其他战争文学相比,“宣抚文学”的作者大多为非作家出身的“宣抚官”,其作品价值不足以引起学界的重视。第二,战后日本学界存在一种观点倾向,认为昭和前期日本战争文学普遍文学性不高。高崎隆治曾坦言,“15年战争,尤其自全面侵华战争开始至战败期间,这个国家(日本——引者注)的文学者与侵略战争之间的耻辱的野合关系,其规模之大史无前例,贴合程度无比紧密,就像展开了一幅划时代的让人目不忍睹的丑陋画卷”,并认为昭和前期日本文学者的“站在军事权力或政治权力一方的各种文学性创作”“确切说是非文学性的”。^③此外,日本学界还有一种更为极端的观点,认为日本昭和前期战争文学无非是文学被政治“奴役”时代下的“奴隶文学”,其价值为零。^④由战后日本学术界、思想界的战争文学认知状况来看,“宣抚文学”惨遭“唾弃”的悲惨境遇也就不难理解了。第三,与战争加害方的立场有关。战后日本文学界对战争责任、对侵华战争的罪恶,还没有形成普遍的悔罪意识,对侵华战争的普遍正确的认识还远远没有形成。^⑤“大部分在日本侵华时期积极协力战争的文化人,在战后纷纷回购、销毁自己创作的战争题材作品,以逃避对其个人战争责任的追究”,“其后(战败后——引者注)的数十年来,素以文献功力见长,以严谨、细致著称的日本文学研究者,除少数学者(如杉野要吉等)对极少数作家的此类作品有过规模有限的讨论之外,大都三缄其口,与原作者的‘若无其事’形成了有趣的默契,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一系列复杂因素裹挟下的战后日本知识界的学术生态与战争认识”。^⑥

然而,作为战争受害方,中国日本学研究者毫无理由去回避战争责任的话题。“宣抚文学”作为日本战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其创作者的出身如何,都应成为日本文学史、思想史叙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宣抚文学”如何被政治“奴役”,其在日本文学史上的真实存在都不应被否认。“宣抚文学”文本在战时的泛滥发行本身就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将看似毫无价值却承载了历史记忆的“宣抚文学”文本挖掘出来进行研究,不仅对战时及战后日本文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进一步梳理日本侵华史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研究“宣抚工作”与“宣抚文学”,可使今人进一步了解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对华“宣抚工作”如何与武力征伐和军事侵略“一文一武”地相互配合对中国实施加害,以及“宣抚文学”如何“协力”日军侵华,亦或可为追问“宣抚官”及“宣抚文学”创作者的战争责任提供史实依据。作为中国日本学研究者,应直面历史,在作为侵华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宣抚工作”逐渐或已经被世人淡忘的今天,在日本右翼势力活跃的当下,将模糊的历史明晰化,将日本文学史中有意无意被遮蔽的“宣抚文学”挖掘出来研究,有助于今人铭记历史、拒绝遗忘、以史为鉴。

(责任编辑:陆晓芳)

①[日]豊川慎「平和の神学の課題としての戦争責任論:フィリピン宗教宣撫班員と戦犯とされた一キリスト者の手記に見る戦争罪責考」,『明治学院大学キリスト教研究所紀要』(49号)2017年2月,第113-142頁。

②王升远《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日本论”》,《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7期。

③[日]高崎隆治:「ペン部隊に関する覚え書」,『日本文学誌要』(通号18)1967年10月,第17-24頁。

④[日]長谷川泉、高橋新太郎『文芸用語の基礎知識』至文堂1982年版,第368頁。

⑤王向远《战后日本文坛对侵华战争及战争责任的认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⑥王升远《关注侵华时期日本文化人的涉华创作》,《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0月18日(第B01版)。